

斯大林大清洗 内幕

〔苏〕列夫·费尔德宾 著
吴长福 弋成隆 译
白素容 武树元



斯大林大清洗 内幕

（苏）阿·瓦·阿列克谢耶夫 著
曹保麟 王德厚 译
陈其南 校



〔苏〕列夫·费尔德宾 著
吴长福 弋成隆
白素容 武树元 译

斯大林大清洗 内幕

书海出版社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СТАЛИНСКИ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ОРЛ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РЕМЯ И МЫ” 1983

斯大林大清洗内幕

〔苏〕列夫·费尔德宾 著 吴长福等 译

书海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12.5 字数: 260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0册

ISBN 7-80550-046-0

G·28 定价: 4.60元

译 者 的 话

列宁在世时已觉察到斯大林身上存在的一些不良品质，因而为斯大林作了完全正确的评价，提出过应该研究改变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说明，列宁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的一些不良品质发展到了严重独断专横、滥用职权的地步，给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造成了莫大的损失。

30年代，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竟歪曲党的原则，违反社会主义的革命法制，在全苏范围内进行了一场“大清洗”，其牵涉对象之广、人数之多、手段之残忍，是骇人听闻的。列宁的许多亲密战友、党和政府的最高层领导人以及大批正直而忠诚的老布尔什维克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严刑逼供，尔后仅仅依据“自供”进行所谓公审，或根本不经审判即行秘密枪决。苏联的历史因而也就被严重歪曲了。

1987年11月2日在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承认斯大林“在争取社会主义及捍卫其成果方面作出的无可怀疑的贡献”的同时，指出斯大林及其亲信所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和违反法制的活动对党和人民犯下了“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罪行”。

今年2月以来，苏联最高法院先后为尼古拉·布哈林、格

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等数十名老布尔什维克平反昭雪，宣布他们无罪。这引起了我国人民的极大关注。苏联30年代“大恐怖”时期的一切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究竟是什么？我国公众头脑里存在着种种谜团，希望尽早解开。

由列夫·费尔德宾撰写的《斯大林“大清洗”内幕》拉开了历史的帷幕，首次披露了“大清洗”运动的真实内幕。本书作者曾任苏联最高法院副检察长等要职，在1938年斯大林“大清洗”时逃亡美国；为了自己的亲属免遭斯大林的迫害，化名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他以一个知情人的身份，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记述了那场给苏联人民带来浩劫的“大清洗”运动的真实过程，斯大林怎样指使亲信暗杀在人民心目中威望比他高的政治局委员基洛夫；怎样逼供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并策划对他们的公审闹剧；怎样把大批老布尔什维克秘密逮捕又秘密枪决；又怎样把知情人一层一层地消灭掉，一个也不放过，直至最后把曾为斯大林大打出手而立下汗马功劳的亲信也打入牢房处死。对这一切书中都有详细的叙述。

本书对于了解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以及评价苏联30年代“大恐怖”时期这段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作者在叙述中不免有些过激言词，读者当能正确分辨，并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加以分析和研究。

本书是依据纽约·耶路撒冷·巴黎“时代与我们”出版社1983年俄文版译出的。

译者

1988年7月

前 言

现在，我已不属于任何党派集团。写这本书并非出于追求某种政治目的，或是为某一集团的狭隘利益服务。我的唯一的宗旨是把至今尚不为人知的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罪行公布于世，让大家了解曾在苏联发生过的某些悲剧性事件。这些事件长期以来是人们的不解之谜。

1938年7月12日以前我曾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担任过苏联政府部门的一系列重要职务。我参加过国内战争，在东南方面军的红军部队里战斗过，并在那里领导过敌后游击队，还负责过反间谍机关的工作。

国内战争结束后，党中央任命我担任苏联最高法院副检察长。在那里，我参与制定苏联第一部刑法典的工作。

1924年，我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后改称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局副局长，负责全苏工业改造和反贪污受贿的监察工作。然后又调往外高加索边防军，担任我国与伊朗、土耳其国境线上的边防军司令。

1926年，我又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外局经济处处长，是对外贸进行国家监督的全权代表。

1936年爆发了西班牙内战。中央政治局派我去西班牙担

任共和国政府顾问，组织反间谍工作和敌后游击战争。我是1936年9月到达西班牙的，留在那里直到1938年7月12日，即我同斯大林政权决裂的那一天。

由于我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过上述职务，我才有机会搜集一些绝密材料，并在以后又把这些材料从苏联带出来。这些材料是指：斯大林为攫取政权所犯下罪行的材料，他为反对一些十月革命领袖而组织的几次大审判的材料以及有关他与许多被害人关系的材料。

我记下的材料有：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口授给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人的各种指示，他对侦查员们所作的如何摧垮列宁老战友的反抗和如何迫使他们写假供词的指示，以及斯大林同受害者的私下谈话和被关押在卢比扬卡秘密监狱里的死囚们的言论。这些精心掩藏的绝密材料我是得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员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是我的下级。这些人中有我的副手米罗诺夫（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局局长，是斯大林策划所谓莫斯科大审判的主要工具之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局副局长鲍里斯·贝尔曼。

斯大林在实现其罪恶计划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没有可靠的同谋者是不行的。随着“大清洗”的发展，他的同谋者也日益增多起来。出于担心自己在外界的名声，他在1937年决定消灭所有“大清洗”的见证人，以防这些人在以后出来作证。1937年春，未经侦查和审判，他就处决了曾按他的旨意向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建者和十月革命的领袖逼取过假供词的几乎所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和侦查员。后来紧接着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数千工作人员的失踪，因为按这些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所处的地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斯

大林举行的秘密情况。

我在西班牙工作时得到了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被捕的消息，后来又听说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相继遇害，看来马上要轮到我的头上了。然而我又不能与斯大林政权公开决裂，在莫斯科还有我的母亲和岳母，按照斯大林的野蛮刑法，如果我拒绝回苏联，那么我母亲就有被处死的危险，我岳母也不免遭此厄运。

在西班牙前线，特别是当我乘车去前沿阵地组织共和国军向敌人发起进攻的时候，我常常遇到敌人炮火的猛烈袭击。这时我脑海里不时出现这样一个念头：要是我是在执行公务中被打死，那么，对我家庭和留在莫斯科的亲人们的威胁立刻会烟消云散，这种命运对我来说会比与莫斯科公开决裂要好些。

但这是我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仍继续在西班牙人中工作，他们对我的勇敢精神称赞不已。我有时也幻想过，也许，斯大林有朝一日会被他的同伙干掉，恶梦一般的“莫斯科大清洗”将很快自行过去。

1937年8月，我接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局局长斯卢茨基发来的电报。在电报中他通知我，佛朗哥和希特勒德国的秘密别动队正在密谋绑架我，想从我身上获得苏联援助西班牙的规模等方面的情报。

斯卢茨基接着还通知我，内务人民委员部准备给我派一支12人组成的私人卫队，由这支卫队负责我的人身安全，并护送我回国。这时我马上联想到，这支“私人卫队”的首要使命就是来干掉我。我给斯卢茨基回电，说明派“私人卫队”没有必要，因为我的司令部昼夜都有西班牙国民近卫军

守卫，在出行时则有西班牙秘密警察机构的武装特工人员伴随着我。这种保卫措施对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私人卫队”尽管没有派来，但这事使我警觉起来。我开始怀疑新上任的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已给自己的秘密“行动小组”下令，要他们在这里，在西班牙把我干掉。预料到会有这种结局，于是我就派了一个助手到作战的前沿阵地去，从德国国际志愿队中挑选了10个富有战斗经验的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这些人成了我的贴身警卫，他们人人都装备了冲锋枪，腰上别着手榴弹，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我。

1937年10月，斯卢茨基的副手——施皮格尔格利亚斯来到西班牙。正是他，3个月以前，在瑞士组织杀害了拒绝返回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驻瑞士的情报工作负责人伊格纳季·赖斯。当然，施皮格尔格利亚斯自己也有担心的事。他的妻子和女儿都留在苏联国内，实际上是作为人质。他对自己今后会有什么下场心中也是无数。也许，他也曾有过摆脱这场游戏的想法。但决不能因此而低估他给我带来的危险。他待在西班牙没有什么正当事可干，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怀疑，特别是当我得知，他在马德里曾经与一个叫做博洛金的人见过面。据说，博洛金是叶若夫派到西班牙来指挥恐怖的“行动小组”的。

施皮格尔格利亚斯和博洛金都不得不考虑到，我身旁随时都有私人卫队跟着，一旦对我下毒手必然会发生激烈的枪战，这样做双方都将受到重大损失，对谁也没有利。这时我突然又想到，莫斯科是否会指使博洛金去绑架我14岁的女儿，以此来要挟我回苏联。我的这种不祥的预感是那么强烈，使我马上驾车奔向城郊我妻子和女儿的住处，把她们用

车送往法国边境。到了法国境内，在离西班牙国境线不远处为她们租了一套不大的别墅。我还给她们留下西班牙秘密警察机构一名可靠的贴身警卫作她们的警卫和司机。随后我就回到巴塞罗那继续执行我的公务。

我等待着，尽量拖延与莫斯科决裂的时间，认为这样做会延长我母亲和岳母的生命。

我仍然没有放弃那种天真的想法，希望会出现某种转机，希望在莫斯科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使这场恶梦般没完没了的“大清洗”恐怖运动彻底结束。

最后，莫斯科终于决定来处理我了。1938年7月9日，我接到叶若夫的电报。当时，叶若夫是位居斯大林之后的第二号人物。电报的内容是命令我马上动身去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务必于7月14日登上停靠在那里的苏联轮船“斯维里”号，与我认识的一位“同志”会面。显然，我还得在苏联驻法国总领事比留科夫的陪同下乘我国驻巴黎使馆的汽车前往那里。当然，比留科夫是“作为中间人执行此项重要使命的最合适人选”。

电文较长，也令人费解。看来，叶若夫和同他一起刚从党中央机关调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那些人都还缺乏经验，他们比不上原先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头们，而现在，这些人已被彻底消灭了。叶若夫他们试图消除我的怀疑，可是又干得那么笨拙，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在电文的字里行间却泄露了天机。事情很清楚，“斯维里”号轮船将成为我的一座水上监狱。不过，作为缓兵之计，我还是及时回了电，告诉他们：“将于预定时间到达安特卫普。”

7月12日，我的同事都聚在巴塞罗那我的住宅前同我告

别。我感到我的同事都已察觉，有个陷阱在等待着我，而且深信，我定会落入这陷阱里去。

过了约两个小时，我到了法国边境。在这里，我同一直伴随着我的警卫和西班牙秘密警察机构的特工人员告别。我的西班牙司机把我从这儿送到佩皮尼昂的一个旅馆，我的妻子和女儿在那儿等着我。我们登上夜班快车，7月13日晨就到达巴黎。这时，我仿佛是刚从正在沉没的船中跳了出来——感到有些茫然，这次行动事先没作准备，因而依然是得救无望。

我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法国境内布满了严密的间谍网，叶若夫的密探很可能在48小时内发现我的行踪。这就是说，要尽快离开法国。

对我来说，唯一安全的避难地是美国。我往美国大使馆打电话，要求与大使威廉·布利特通话。这天，正好是法国国庆节——攻占巴士底监狱纪念日的前夕，接电话的人告诉我，现在大使不在城里。当时，我按妻子的建议，马上前往加拿大驻法国代表处。在这里，我出示了我们3人的外交护照，以带全家去魁北克度暑假为由要求给予签证。

当时，苏联和加拿大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我十分担心，代表处可能拒绝我的签证要求。但该处首席代表曾担任过加拿大移民机构专员，他对我们颇表同情。除签证外，他还特别给魁北克移民机构写了封信，让我带上，请他们在我有困难时给予协助。

凑巧得很，与我们同时到代表处大楼里的还有一位加拿大牧师，他同横渡大西洋航行的船队有点关系。他告诉我们，加拿大“蒙克莱尔”号轮船今天从瑟堡起航，还剩下几

个舱位。我得此消息后立刻奔向售票处，妻子急忙回旅馆接来女儿。我们3人在火车刚要开动前赶到了火车站。经过几个小时后我们顺利地 在瑟堡换上了轮船，又过了1个多小时光景，我们终于离开了欧洲大陆。

我女儿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开始了这次旅行。她依旧那样怡然自得、无忧无虑，好象所发生的一切与她毫无关系。妻子和我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一切告诉她。她不知道，从此后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朋友、祖母、外婆和祖国了。

从1926年开始，我的工作要求我大部分时间都得居住在国外，但我的女儿对祖国和祖国人民的爱却从没有因此而显得淡漠。她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这影响她经常去观察生活，了解自己同胞的疾苦。至于谈到斯大林的残酷制度，她几乎一无所知。我和妻子从来不想打消她的幻想。她生性善良，对任何一点点残酷的事情都深恶痛绝，对任何遭受磨难的人都寄予无限的同情。由于疾病，她可能将不久于人世了，我们想尽量不把真实情况——斯大林的暴政和俄国人民的不幸——告诉她。

很难向她解释清楚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她终于明白了。她听我们道出了真情，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她知道的世界原来完全不是她所臆想的那样，她的幻想成了泡影。她知道她的父母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曾捍卫过革命事业。现在她很替我们难过。她一下子好象长大了许多，她成熟了。

到了加拿大后我立刻给斯大林写了封长信，并把此信复制件寄给了叶若夫。信中我告诉我1924年起就与之有直接交往的斯大林，我对他所实施的暴政的态度。但这不是我写这

封信的主要意图，我是想通过写信挽救母亲和岳母的生命。当然，在信中哀求斯大林保全她们的生命，想唤起他的善心将完全是徒劳的。在同斯大林打交道时我选择了另一种做法，一种更适宜的做法。在信中，我以最大的决心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他敢于对我母亲和岳母进行报复行动，我就要把我所知道的他在“大清洗”中的所作所为公布于世。为了证明这并非凭空威胁，我列出了他的罪行附录于信后。

此外，我还警告他，即使他派来的人把我杀死，那么我的律师也会立即把他的罪行公布出来。我很了解斯大林，我确信他会认真考虑我的警告的。

我感到我是在进行一场对我自己和我家庭都十分危险的搏斗。但我深信，斯大林会推迟自己的报复行动。我深信，在没有达到他的预定目的——绑架我和迫使我交出我的秘密笔记之前，他是不会采取这种行动的。当然，他会极力设法充分满足自己的复仇欲，但必须在确信他的罪行不被揭露出来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这种行动。

1938年8月13日，我在西班牙失踪后整整1个月，我带着美国驻渥太华代表处首席代表的外交签证，来到了美国。

到美国后，我和我的律师立刻前往华盛顿。在这儿，我向移民事务专员声明与自己国家的政府脱离关系，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

随之而来的是斯大林对我的通缉行动，这一行动延续了整整40年。在这一场对抗中，斯大林一方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和无数的密探；而我这一方，仅仅是靠我自己是否能及时预见和识破他们的诡计以及我的亲人——妻子和女儿的奋不顾身精神和勇敢精神。

许多年来，我们一直避免与国内亲人和朋友们通信，以免连累他们，使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我们得不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1953年初，我和妻子认为，我们的两位母亲已不会再在人世，可以冒险出版这本书了。2月份，我开始同《生活》杂志的一个编辑谈判发表此书的部分章节问题。谈判正进行时，斯大林去世了。我感到很失望，他没有再多活些时候，如果他再活些时候，就会看到全世界传遍他的所谓大清洗的内幕材料，使他相信，要掩盖事实真相是不能得逞的。

斯大林的死并不意味着我不用再为个人安危担忧了，克里姆林宫还会象以前一样力图掩盖事实真相，也还会象以前一样千方百计对我进行报复，以便杀一儆百，教训那些想以我为榜样的人。

列夫·费尔德宾

1953年6月于纽约

目 录

前言.....	(1)
揭开基洛夫被害之谜.....	(1)
斯大林的惯用伎俩.....	(25)
荒谬绝伦的大审判.....	(41)
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台拷问的机器.....	(58)
我们的生命一文不值.....	(83)
无名英雄.....	(88)
老朋友反目成仇.....	(96)
党员的义务.....	(109)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克里姆林宫的交易.....	(112)
我再也不想当党员了.....	(135)
报复.....	(143)
一对身陷囹圄的夫妇.....	(149)
莫洛托夫险遭逮捕.....	(155)
最后的时刻.....	(161)
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失算.....	(174)
尤里·皮亚塔科夫.....	(180)
卡尔·拉杰克.....	(196)
败露.....	(212)

消灭肃反工作人员·····	(217)
军队失去首脑·····	(241)
亚戈达在牢房中·····	(253)
“医生暗害事件”真相·····	(269)
收买高尔基的企图未能得逞·····	(275)
尼古拉·布哈林·····	(286)
最老的党员·····	(295)
替罪羊·····	(302)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309)
斯大林最亲密的朋友·····	(312)
斯大林妻子之死·····	(323)
斯大林妻弟的遭遇·····	(331)
维辛斯基·····	(337)
斯大林的警卫队长·····	(351)
后记·····	约瑟夫·科辛斯基 (367)

